

“好人政府”的来龙去脉

——兼析李大钊与“好人政府”的关系

刘国有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法学系, 天津 300382)

摘要:1922年8—11月,李大钊、白坚武、胡适、蔡元培等借助吴佩孚的支持,恢复了民国初期首届国会,推出了以王宠惠为首的“好人政府”和系列改革措施,这是李大钊等组建民主联合阵线的初次尝试,对废止恶法、保护工会运动和中俄复交都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是中国民主进程的重要遗产。

关键词:李大钊;白坚武;好人政府;民主统一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4-0008-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4.002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 by the Good”: 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Dazhao and This Government

LIU Guo-you

(Department of Law, Tianjin Public Security Profession College, Tianjin 30038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from Wu Peifu, Li Dazhao, Bai Jianwu, Hu Shi and Cai Yuanpei restored the first congress esta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produced the “Government by the Good” led by Wang Chonghui and a series of reform programs from the August to November in 1922. This was their first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united democratic front and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abolishing evil laws, defending labor union movement and resum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t became a valuable heritage during China’s democratization progress.

Key Words: Li Dazhao; Bai Jianwu; Government by the Good; democratic and unitary

1922年直奉战争后,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白坚武等利用新军阀吴佩孚积极干预政局的机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推出了号称“好人政府”的王宠惠^①内阁。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内做了大量工作,有力推动了民主改革新

局面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参与领导民主革命的一次尝试,开启了中俄关系正常化进程,为中国未来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好人政府”的酝酿与成立

直奉战争后,李大钊即与白坚武密切联系,

作者简介:刘国有(1968—),男,天津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学和李大钊思想研究。

^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挽回不少权利,是民国时学者型官僚的代表。

积极推动吴佩孚与中共的合作。以直系武力和新兴的中共等进步力量为基础,推动国家统一,这也是白坚武此时的重要思想。“民国十一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我们都看出来直方可以稳操胜算。有一天,我夜访蔡先生,谈到与吴子玉联络的事,蔡要我参与。那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结束,大家计划着怎样赶走徐世昌,怎样迎回黎元洪。这些事均由李大钊(守常)负责与吴方联络,吴则派白坚武、孙丹林在北京与李接触,彼此互通声气。”“战争结束后,由王宠惠于民国十一年九月组阁,我与李守常参与蔡先生的活动,并负责跟吴佩孚方面的代表联络。”^{[1]30}

1922年4月22日,胡适给蔡元培写信,说林长民动员他参与政治,“林宗孟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君任(钧任)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2]594}。蔡回信说:“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2]594}1922年4月27日,白坚武“草统一南北方法数纸,从吴公嘱也”。1922年5月10日,战事稍有眉目,白即“代吴公草恢复法统通电,先密征各省同意”。11日,他又致信孙洪伊陈述政治主张,同时要吴佩孚聘请李大钊等为政治顾问,“函申江友人告以吴公决心恢复法统。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3]356}。至此,白、李、胡的政策指向已基本趋同,认为和平统一必须恢复第一届国会,“现境分裂至此,非恢复法统无法以统一南北。故力为之主持也”^{[3]359}。

1922年5月13日,蔡元培领衔,与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胡适、李大钊、徐宝璜^①等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呼吁成立接受

监督、反腐倡廉、为民谋利、保护自由的“好政府”,即“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2]512}。要求实行“有计划的政治”,南北双方尽快举行和平谈判,反对武力统一;恢复1917年被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尽快完成制宪,确定精兵简政的具体办法,裁撤多余冗员,采用直接选举制,削减议员名额。胡适说:“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可以做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2]594}5月12日7时,胡“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十一时相见”^{[2]604}。次日,到会的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汤尔和、徐伯轩等都同意列名。下午三点,王宠惠、罗文干等来,“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2]622-623}。16日,白坚武收到胡适、李大钊的政策建议。“胡适之、李守常均有函表示政治主张,中有纲领条目宜分先后者,亦列入一册。开南北和会一节,徒延时日,多涉纠纷,余意尤不表同情,安有真正民意附内?”^{[3]360}5月22日,蔡元培、王宠惠、梁启超等联名公电曹锟、吴佩孚,要求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南北举行和会,完成制宪。“经约集在京同人讨论,金以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制宪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但宪法未完成以前,所有统一、善后各问题,应由南北各省选派代表,于适中之地组织会议,协谋解决。诸公伟略硕望,举国所仰,倘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②

7月20日,北京传出王宠惠组阁口风,“此说由某通讯社传出,见者多疑其不伦,昨晤以法

①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官费留美。1916年回国,先后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在北大师生中有很大影响力。

② 《熊希龄等响应曹吴之祸电》,载于《申报》1922年5月27日第7版。

学派人物,询此事之由来。据云,王确有此意,惟以着手甚难,故先放出一种空气,以窥各方面之批评”^①。7月底,吴佩孚致电中央,要求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出面组阁,王宠惠内阁浮出水面,“洛阳来电之意,以华府会议之代表组织内阁较为适当,故昨日王宠惠登台说,又极兴旺”^②。7月30日,黎元洪因难以挽留颜惠庆,亲劝王宠惠代理,“黄陂因颜揆可以挽留与否未有把握,昨早(三十)又亲劝王亮畴代阁,王氏宣誓不干,并于昨日赴西山,嗣被顾维钧竭力劝止,未能成行”^③。7月31日,代总理颜惠庆提出辞职,并推王宠惠继任。8月3日,黎元洪召集次长以上高官开会,宣布提名王宠惠代总理,“总理唐绍仪未到任前,王宠惠代理……预料明日即可发表”^④。8月8日,吴佩孚再次致电黎元洪,请其提名王宠惠为正式内阁总理,白坚武还联合直系各省,“主以王宠惠组阁”^{[3]375}。

二、“好人政府”的指导思想

1922年6月李大钊领衔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说:“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凡是此时住在中国的人,我们想,恐怕没有不感觉武人的横行和人民所受的困苦的。军阀盘据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的掌握。他们登用一般趋炎附势藉公肥私的官僚,豢养一群毫无纪律的土匪式的兵士。他们为保存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一大群寄生阶级,遂迫而横征暴敛。他们因军队太多,一省地盘不足,遂迫而侵略邻省。于是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养赡游民和争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4]376}这里,李大钊等把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军阀横暴,解决办法是废督裁兵和统一国家。“改

良物质生活的惟一办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斗争的手段是群众性政治运动,即集会、游行、宣传和抵制。“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4]377}“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以实现民主主义。”这里的民主主义,就是胡适、李大钊等提出的颁布宪法实行选举,建立有监督、可制约、有计划的政治。

1922年9月17日,李大钊对《北京周报》记者说,必须削弱督军的势力,“首先在中央要具备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治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上策”。但是,军阀们不会自动削弱自己的实力,因为他们并非依法拥有兵力的贵族,而是依靠军队收取苛捐杂税来获得非法利益的“特种商人”,只有发动群众起来反抗,或者逐步筹集资金削弱军阀势力。“只要中央能有数千万的收入,把各督军的兵力集中到中央手里是不难办到的。……如果明确规定这些军费由中央来支付,那么各地的士兵必将拉起队伍向中央集中……地方的兵力必然逐渐削弱。一旦兵力被集中于中央之时,就可以对其一部分加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成为中央的军队,而将其余的大多数用于开垦、矿山等使用,这样一来统一也就自然形成,剩下来就只有东三省和广东问题了。”^{[5]97}李大钊认为,

① 《最近组阁之人物观》,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22日第3版。

② 《传闻互异之内阁问题》,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28日第3版。

③ 《内阁行将改组之昨讯》,载于《顺天时报》1922年7月31日第2版。

④ 《北京电》,载于《益世报》1922年8月5日第2版。

充分发动群众,如工会、商会、农会等的力量,就可以削弱督军,最终推倒督军制。“各地深受军人飞扬跋扈之苦,都深切期望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世界各国也都盼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他预计会有一段时间,“但统一政府的出现已是必然的明显的事实,我们应为它的出现而努力”^{[5]97}。

李、胡等设想的统一政治架构是联省自治和县自治,也就是地方分权与民主化。1922年7月10日,蔡元培公电吴佩孚,动员他同意联省自治,“蔡元培于陷日致电吴佩孚,对于裁兵废督,有所论列,对联省自治亦颇倾向”^①。对此思想,国会内占有重要势力的研究系和讨论系,以及陈炯明、张作霖、卢永祥等地方军阀都表示认可,湖南、四川等省甚至开始自定宪法,并提出不少进步内容。但吴佩孚、白坚武等认为,联省自治不过为军阀割据提供法律依据,无助于国家统一。“我国自改建共和以来,中央政府之懦弱,各省武人之跋扈,固已演成鞭长莫及、尾大不掉之势,设再冒然实行联省自治制,更予各省把持政权者,以为所欲为之凭借乎?且也近日各省制定之宪法,并非出自各省人民之公意,不过各该武人勾结所谓代表民意者之少数私见,借此以为假面具、护身符,俾遂其永久割据,不受中央节制之私心耳。”^②

革命党人内部也有种种疑问。1922年7月初,国民党核心领导成员张继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元洪政府不易维持,吴佩孚的统一之梦也很难实现。“黎氏政府,至能继续与否,甚为疑问,余意若能持续四个月,即为良好之结果。惟近来英美人及日本人,皆以吴佩孚为伟人,而殊不知其有何等伟大之处……依余观之,吴氏有如空中楼阁,此次不过作一中国统一之梦。……陈氏(炯明)与吴佩孚提议,或以南北统一为目的,亦不过一时的提携,两者亦绝非由衷心

融合。”^③章太炎甚至责骂蔡元培等依附叛逆,为虎作伥。蔡元培回答说:“南北对峙,拥兵者有所借口,增招不遑,何从言裁!溯西南举兵,昌言护法,一由于国会被非法解散,二由于北方总统由非法议会举出,二因不去,则虽有圆满之分赃条件,南方当局无法承认,今徐世昌已告退,而被解散之议会亦已恢复,则前此举兵之二因,均已消灭,不乘此时停止兵事,谢去非常国会权宜选举之总统,使南北两方留滞之议员共同集会,免不足法定人数之缺点,以完成宪法。而必以继此权宜之局,以延长战祸,是以护法始,而以争总统终,全国其谓之何?弟等一电,不过本敬仰中山先生及非常国会诸议员之诚意,而为爱人以德之劝告,明白彰著!所谓(为人傀儡者)何指?若置身炮火不及之地而鼓吹战争,或不免有为军阀傀儡之嫌疑,而且是以无知识之兵丁为傀儡,正弟所不忍为者耳。弟前与诸同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曾表示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又曾与熊秉三、汪伯唐诸君合发一电,主张恢复国会外,并由各省代表组织会议,以解决一切善后问题,若此种会议果能实现,则或取各省所主张之联省自治,或取李石曾君所主张之南北分治,皆可于此会议中协商而决之。”^④

为打消社会各界对恢复国会、和平统一的顾虑,李大钊开始了穿梭式动员访问。1922年8月26日,李大钊抵上海拜会孙中山、张继等,讨论国共合作等重大政治议题。27日,他致函胡适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而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4]311}李大钊、陈独秀

① 《吴佩孚复蔡元培之支电》,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10日第6版。

② 《联省自治坎割据之变相坎》,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28日第6版。

③ 《张继对日报记者之谈话》,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3日第6版。

④ 《蔡元培复章太炎张溥泉电》,载于《益世报》1922年6月17日第7版。

等随即加入国民党。9月8日,李大钊到洛阳会见白坚武等人,“守常自申江来,谈申江寓公近情”,第二天又与白“共谈南北政情、人事长短得失大略”。11日晨才返回北京。10月10日,“孙中山代表张溥泉及王励斋、李守常来洛。张与吴将军握谈甚欢”^{[3]385}。当晚,白坚武与李大钊就北京政局彻夜长谈。10号下午,他们主宾广泛游览洛阳名胜,“登临尽日,夕阳归来”。11日,张继、李大钊离洛,吴佩孚等亲到车站送行,“偕吴巡使、李参谋长送张溥泉、王励斋、李守常、项子和至金谷园车站握别”^{[3]386}。当时警探的一份报告亦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即过激派之集产党,信仰马克思学说……闻其中央执行部联络一般学界,如胡适、李石曾辈,进行其所谓‘好政府’之预备也。”^[6]

三、“好人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好人政府”是李大钊、白坚武、胡适、蔡元培等借助军阀,以政治手段推动民主统一的伟大尝试。1922年1月22日,吴佩孚招待白坚武、孙丹林等吃饭,白借此向吴提出了全面政策建议。“吴子玉将军请寓中公宴,晚约陶竹轩、孙汉忱叙谈,余亦在座,便中讽告以根本之计。”5月12日,白坚武嘱吴佩孚拉拢齐燮元,“嘱吴公再电齐督表示亲密,齐曾代拟通电稿,复电赞慰”。13日,针对曹锟周围某些人的不断破坏,白又上书坚决主张恢复法统。“闻保定督署宵小破坏法统恢复之说,当局颇涉犹豫,余致书详陈利害,以去就力争。”“余意稍缓,现境分裂至此,非恢复法统无法以统一南北,故力为之主持也。”^{[3]359}5月31日,白坚武为吴佩孚起草通电,敦促徐世昌辞职,“余为吴巡使草一稿,促东海退休以全身,俟宁督电出即拍”。1922年6月2日,曹锟、吴佩孚等领衔多省军民长官,“电请黎黄陂依法复位,并通电全国请一致赞促”。1922年8月27日,吴佩孚等再次公电,支持王宠惠组阁;28日,吴佩孚严厉斥责蒋士立,拒绝张绍曾组阁,“蒋士立自京来洛,为张敬舆组阁作说客,吴公大斥之”。29日,吴佩孚公电张绍曾:“有朝行组阁夕即通电断绝关系语,以示申戒。”^{[3]376}

胡适、罗文干等很早就与李大钊一起参与政治活动,是李重要的党外朋友。1920年8月1日,胡适、李大钊、蒋梦麟、高一涵等一起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禁止政治集会和罢工的治安警察法,取消限制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和报纸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人身保护法、保护公民自由,组织选举监督团,监督选举^{[4]353-355}。1920年8月20日,李大钊、王文彬、何恩枢等北京社会主义研究会成员联合蔡元培、罗文干、陈启修等发表了《提倡临时国民大会启事》,要求同时解散北京的安福国会和南方非常国会,裁减军队,惩办帝制分子,保障公民自由,安福国会“产自非法,根本不能成立”。非常国会“已失时效,当然不能继续存在”。“军队原以御外侮,而我国则以军队酿内乱,亟应裁减以轻人民负担,以儆效尤。督军、巡阅、军区长以及其它同等军阀制度,均应一律废除,以符民治精神。”“民国财政,人民罔有闻知。一听奸人滥借外债,咸归中饱,饮鸩止渴,可为寒心。嗣后岁出入亟应公布,预算决算,亦须依法办理,并严禁秘密借款,以妨贪冒。”^{[4]356-358}1922年6月10日,李大钊对胡适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6月25日,胡适又与蔡元培、李大钊见面,“与子民先生及守常等小谈”。这里未说明谈话的内容,但胡对王阁确是十分关心。1922年7月27日,他“久不出门,竟不知国事闹到什么地步。守常谈甚久,我们都觉得现状可危”^{[2]651}。

联系王宠惠、罗文干及研究系之事,主要是胡适负责。1922年5月15日,胡适与罗文干谈话四个小时,“罗钧任来谈了四点钟。他说,今早林宗孟打电话请他和亮畴吃饭,说有要事相商。他到时任公、百里都在”。5月21日,王宠惠与蔡元培等一起吃饭。“亮畴邀在法学会吃饭,遇着子民、君任、任公、宗孟、秉三、董授经(康)、颜骏人(惠庆)、周子虞(自齐)、张镒西(耀曾)。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

行的方向。……董授经是很老实的人,极力答应实行财政公开的主张(因为他近有财政总长之望,已定了),但我怕他太老实了,干不下这样一件大事。”5月27日,“宗孟邀吃饭,同坐有子民、亮畴、汪伯唐、任公、钧任、唐天如、张公权等”^{[2]633}。6月2日,张耀曾又请胡、蔡等吃饭,“席上蔡先生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2]639}。

1922年6月20日,胡适参加了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等发起的茶话会。“子民、亮畴、少川、钧任发起一个茶话会,邀了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顾宅谈话,讨论今日切近的问题。这个意思甚好,我因与钧任提议,继续定期开茶话会,每次由四五个人作主人。大家赞成此议,下次的主人中,我也是个。”“今天到会的有丁在君、张君勱、秦景阳、陈聘丞……等,讨论的总题是‘统一’。”^{[2]659}但胡适对王宠惠组阁并无太大信心。“推亮畴代理,是特别的举动,是洛阳的意旨。照例总理缺人,先轮外交,次轮内务;内务本为张国淦兼的,是一个极刁滑的政客,拨弄出许多政潮,后来不能不辞去,让孙丹林以次长代理,故轮到了司法代理总理。”“亮畴太老实了,不知能干下去不能。”

联系白坚武、孙丹林的,主要是李大钊。1922年6月19日,孙丹林通过李大钊约胡适吃饭,胡回忆:“孙丹林(汉尘)来京,现暂就内务次长的事,他要和我们谈谈,故守常约我和子丈、石曾同他吃饭。此人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他的功劳。”1922年8月13日,胡适通过李大钊约孙丹林见面,“我观察近来的政局,心里着实不安。今夜打电话给守常,让他规诫孙丹林、白愷亚们不要瞎摸了,必须镇静的看出一条路来,然后下子。守常打电话去告诉孙丹林,孙约明晚邀请蔡先生们一

谈”^{[2]701,711}。此次谈话前,胡适“想试做一个政治计划,预备今晚与孙丹林谈话的底子,写了一千多字”,包括财政与统一问题,同坐者有蔡元培、汤尔和、蒋梦麟、李大钊,“我们谈的都是很恳切的忠告。孙的态度很不好。他似乎还在那儿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后来,他的态度稍软下来了,也承认吴佩孚对于联省自治应该逐渐改变态度,不可没有一个退步”^{[2]715}。

对白坚武、吴佩孚等的和平努力,李大钊是赞同的。1922年6月7日,李大钊赶赴洛阳,“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3]363}。7月4日,白坚武与王晓云、张则民谈话,要他们转告孙洪伊,“宜竭力襄助统一”。1922年7月7日,白坚武致信李大钊,通报统一事务的最新进展,“寄李守常1函,叙日来进行各事”。对联省自治等地方制度方案,白坚武除征求各省军阀意见外,还特地征求了胡适和李大钊的意见,“余并托王晓云①、李守常、胡适之等多草方案”^{[3]368}。1922年8月1日,白坚武回函李大钊,“详言余困难苦痛之处,并答来询各件”^{[3]371}。9月8日,李大钊从上海到洛阳停留三天,11日返回北京,与白坚武等“共谈南北政情、人事之短长得失大略”^{[3]378}。9月28日,孙洪伊致信白坚武介绍张继赴洛阳接洽。1922年10月,张继发表谈话,宣布国民党人将对国内实力派进行穿梭式访问。“余近将就途赴南京访齐燮元,次到洛阳访吴佩孚,再到保定访曹錕,此外汪兆铭赴奉天访张作霖,胡汉民赴天津访段祺瑞,郭泰祺赴北京访黎元洪,至此次吾等北上之意义,全系对北方前派代表南来之答礼,如曹錕、吴佩孚两氏,有真正之诚意时,一切皆可商量。但吴氏果终止战争与否,吾此次会见对此等事,及吾人主张之工兵问题等,想均能交换意见。”^②

四、“好人政府”的主要成绩

按照李大钊等人设想,国会召开以后,先由黎元洪任过渡总统,挑选优秀专家组成内阁,完

① 似应为王试功,字嘯云、晓云,直隶怀来人,时任参议院议员。

② 《日报记孙文及张继之谈话》,载于《益世报》1922年10月2日第6版。

成制宪等一系列立法工作,然后进行大选,完成国家和平统一。由于曹锟等军阀的破坏,这一计划没有成功,王宠惠从署阁到辞职不过百天,成为北洋时代诸多短命内阁之一。但因王阁及李、胡、蔡、白等人的努力,短命的“好人政府”也取得了若干成绩。

“好人政府”首先致力于南北统一,成立联合内阁。黎元洪和王宠惠都曾试图吸收多名国民党人进入内阁,但遭到吴佩孚等人反对,也曾努力恢复地方自治,首先是首都北京的民主选举。1922年6月18日,黎元洪政府宣布北京改为特别市,民选市长。1922年7月14日,北京教育会召开临时评议会,决定响应京都自治研究会的呼吁,积极参与北京自治,并成立研究编著和执行两部,高一涵、李大钊、杜国庠等九人被推举为研究编著部成员,认为“市政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民国十年七月颁布的‘市自治制’有修正的必要,我们以为应该参照北京市的实在情形斟酌修正,以能实行及实行时不致发生弊害为标准。”“我们反对少数地痞假借名义把持市政,我们反对官僚政客以市政的职务为交换的私利和吃饭的处所。我们主张人才主义,要求市民不存籍贯的歧视,一致努力务使公正而有学识的人能被选为市政机关的职员。”^①京都自治研究会则主张公开京都自治和选举办理情况,禁止少数人包办;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京都自治和选举筹备工作;开放三海公园,免收门票。“本会会议结果,以为选举要点,惟有依法公开、严禁包办两事。……应组织京都市选举委员会,由内务总长指派京都市内之公正市民组织之,城内外每区,郊外每□(原文不清,以□代之),均按二人计算,合计七十四人,加以各职业团体,酌量指派,总计九十人为度,禀呈内务总长之监督,负担上述之任务……

官民通力合作,结果尤当良好。”^②

交通总长高恩洪^③更是内阁里的急进派,一上任就大刀阔斧,裁减冗员,裁撤货捐,增加运量,缩减靡费,开源节流,并整顿腐败不堪的交通部。李大钊安排中共人士进入交通部工作,也是利用了此一机会。因此,社会各界对高好评如潮:“自高恩洪入长交通以来,虽行政之日无多,而增加国家之收入是巨,即仅就节流之计划而论,自本部及各路裁员减政之结果,每岁可省者,已不下两千万之谱。至开源办法,除增加些许运脚并酌加邮电等费外,更拟接续兴办粤汉陇海沪杭甬等铁路之工程,约计每年可增加收入复可达一万万元以上。准此而谈,是一转移间,不特政府可增一万数千万之巨款,且可还清内外各债利息,每月又减轻二百五十万元之支出,似此不畏强御,任劳任怨之称职人员,以视历任交通当局之废弛事务,滥借外债,以公帑供私人之指挥者,又奚可以道里计?”^④胡适也说:“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的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各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各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2]660}

开启中俄邦交正常化谈判,也从王阁开始。1922年5月22日,李大钊介绍苏俄代表霍德罗夫(贺德罗夫)拜见吴佩孚,并与白坚武详细交谈。“俄人霍德罗夫来保定谒吴公,并以李守常之介绍同余做主义上之深谈。余答话分三段,一新主义之结合;一新主义之趋势;一远东问题。”霍氏的翻译,S. Y 成员薛撼岳亦颇受好评,不久即任吴佩孚外交顾问,“介绍薛撼岳见吴子玉将军,聘充外交顾问,办理外交事件”^{[3]365}。这里的主义与“远东问题”,应该包括

① 《北京教育会对于京都市自治之决议》,载于《顺天时报》1922年7月15日第7版。

② 《北京市民对于市自治之建议》,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25日第7版。

③ 高恩洪(1875—1943),字定安,亦作定庵。山东蓬莱人,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192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教育总长。

④ 《攻击高者可以休矣》,载于《益世报》1922年7月30日第6版。

民主主义与中俄邦交。7月17日,霍德罗夫又来洛晤白,事涉中俄通商、中东铁路、外蒙古、中俄联合抗日等,“俄贺德罗夫为中俄通商事,谈中东铁路及黑龙江、松花江国际关系利害甚详,并述日人黑龙会经营蒙古暗幕,为中国代筹,有诸多见到之处,惜内阁不得人,未易措办”。双方交谈甚欢,“余对彼良亲爱,彼临行勉余以耐苦,尤感也”^{[3]369}。

1922年8月12日,苏俄代表越飞(约佛)抵京拜会了总统黎元洪,希望获得中国的食物和能源帮助,同意交还外蒙古。1922年8月18日,李大钊公宴越飞,盛赞苏俄善意,“越飞君在日、俄会议未开幕以前,先行来京,此点吾人颇为重视。盖借此足证中、俄在对日政策上,实有互相提携之必要”^{[5]91}。陪同的胡适、蔡元培等都发表了公开讲话,胡适回忆说:“夜七时,守常请俄国新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来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 Ivanoff 及参赞二人。陪客的有子民、孟和、石曾、梦麟,子民有演说,我也演说了几句,约佛作答。”^{[2]717}

8月20日,越飞派人到洛阳拜访白坚武,“新俄代表越飞,遣参赞为蒙古事来洛”^{[3]375}。越飞与孙中山谈判也从此时开始。“先生(孙文)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与越飞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孙夫人、林伯渠和李大钊亦参加,一连整整谈了六天”^[7]。10月19日,俄外交参赞来洛拜访吴佩孚,“新俄盖参赞来洛,余公毕访之,夜谈。渠希望早开中俄会议,且诋外长顾维钧应付外交失当”。20日,盖参赞与白坚武等举行正式会谈,“俄劳农政府代表团盖参赞来洛,表诚意之国交,余与晤谈颇洽”^{[3]388}。

五、“好人政府”的失败

“好人政府”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具有偶然性。“原先李守常与吴左右的几个人,都是天津法政学堂同学,彼此联络起来,准备有所作为,并且看到吴为人真诚坦白,想利用吴。惟彼等因声望不够,就拉蔡先生直接出面,与吴联络。……王阁是蔡先生计划好,要吴照办。当时王宠

惠跟孙总理关系疏远。……王阁是过渡内阁,并不准备它负起什么重大的使命,蔡先生的计划是预备在十月五日(阴历八月十五日)由孙洪伊正式组阁。蔡先生对我说:‘等正式内阁成立后,我们再参加。’蔡先生的意思,也许要我跟李守常参加孙阁。”^{[1]125}这就惹恼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人,他们围绕在曹锟周围,利用黎元洪的摇摆和无知,不断攻击王宠惠内阁,“王宠惠组阁前,吴与蔡把一切有关国会的事皆交给小孙(孙洪伊)派(即民治派)的议员包办,结果把吴大头(吴景濂)一派的人全给排去,罗文干案就是吴大头所主使,对小孙派的报复”^{[1]26}。因此,王宠惠一上台就到处碰壁,十分困难。

重重困难之下,王宠惠十分消极,说自己只是暂代,不必拟定计划,胡适、蔡元培也渐渐对王内阁失去了兴趣。1922年9月7日,胡适写信给罗文干,批评内阁对于教育经费等缺乏足够的支持:“亮畴终不能摆脱‘不负责任’的批评。……亮畴当此残局,未免太苦;似不如早日远引,留一个有用之才为将来之用。”10月27日,在顾维钧举办的茶话会上,王宠惠等的抱怨让胡适等非常失望。“亮畴、钧任又大发牢骚,到处骂人,大家都不满意。最后蔡先生起来说,‘我提议这个茶会今天以后不继续开会了。就是要开,也须要等王、罗几位出了阁之后’。”胡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亮畴竟是一个无用之人;钧任稍胜,但也不能肩此重担;少川稍镇静,头脑也稍明白,但他终为罗、王所累,不能有为。”^{[2]821}

即使是王阁的铁杆支柱吴佩孚,地位也非常脆弱。“在曹锟圈内圈外的人,都是反对吴的,只有曹锟信任他,曹锟之所以信任他,也是时势使然,并非出自本心。”^{[1]12}面对曹锟周围政客不断的鼓噪,吴佩孚也只能甘拜下风。“洛吴意见亦以先制宪为然,以宪法为国家百年根本至计,至于总统问题平素不赞一词。但津保

既积极进行,洛方亦不便力事劝阻。”^①作为吴佩孚的政务处长,白坚武也因作风强悍被孤立,处境困难。白说自己“以客卿而参与机要,职责未定,权限不明,遂令劳重于山,怨深似海,殊有不可同居之叹;惟患难未过,不可遽去”^{[3]374}。1922年9月22日,白坚武又感慨自己树敌过多,前途堪虞。“好恶过于分明,则可东可西之人皆为我之敌国,终必致败,余于孙汉忱再再言矣。迄不能免。前途浩浩,难言之矣,其能免于败呼?余思之,盖重有忧矣。”^{[3]381}11月8—15日,他又说:“吴使长于用兵,短于施政,地位既高,谰言日至,往往拒谏饰非,前路茫茫,殊可虑也。”“余日来全为小人怨府,而无一树立规范之机会。”“津、保对余情感甚恶。邪正不两立,自古已然。惜余日为吴使赞助,并无脚踏实地利国之举。”^{[3]392}

1922年11月16日,代总理王宠惠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外交大楼公开对骂,揭开了二人长期以来暗斗的盖子。“十六日晚,顾维钧因鲁案问题,特在外交大楼,宴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并邀众议院正副议长及阁员作陪,王宠惠与吴景濂因辩论动气,双方竞至破口相骂。”^②为尽快推倒王阁,吴景濂竟勾结军警,绕过议会和法庭等合法机关,强迫总统黎元洪下令军警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这是使用军警逮捕现任内阁成员的违法之举,也是北京政府一大丑闻,王宠惠被迫辞职。“军警逮罗(文干)未经法律手续,王揆怒极,质问黄陂,黄陂饬释罗,另以正式手续送法庭。王揆辞职,顾维钧代理,某方倒阁运动至此奏凯。”^③

六、结语

中共二大决议要求:“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8]66}还要参与议会

运动,组织议会党团。“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74}李大钊联合国民党人、进步知识界及白坚武、吴佩孚组织“好人政府”,正是在贯彻此一决议,这让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舞台初试锋芒,开启了劳工立法和恶法废止运动,保护了新兴的工人运动,推动了中俄复交运动。由于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吴佩孚的退缩,这一努力没有成功,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参考文献:

- [1] 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M]. 王聿均,访问. 刘凤翰,记录.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2] 胡适. 胡适全集:第29卷[M]. 季羨林,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3] 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M]. 杜春和,耿来金,整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4]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史事综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11.
- [7] 辛亥革命回忆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61:592.
- [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李亚平)

① 《某要人关于洛吴态度之谈话》,载于《顺天时报》1923年6月6日第2版。

② 《王吴冲突详志》,载于《大公报》1922年11月19日第2张第2版。

③ 《又电》,载于《大公报》1922年11月20日第1张第2版。